



刘君

# 另一张身份证

我妈说第一次见到我爸时，以为遇到了外国人，我爸的话她几乎一句也听不懂。

我爸讲一口广西话，自认为已经说得很“普通”了，但大多数人仍然很难听懂。我妈则讲一口地道的山东胶东话，也十分难懂，有人形容听起来像唱歌一样。

20世纪60年代末，我妈千里迢迢，从山东的威海到新疆的兵团农场和我爸结婚。

据我妈说，我爸同事的老婆是我妈一个村的小学同学，热心地给他们俩牵线搭桥，然后他们就开始了一来一往的书信交流。

那个年代电话还不普及。没有电脑，没有网络。没有一秒拉黑，也没有一键转发。交流，就靠一封封的书信。

我妈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多远的距离，需要买几分钱的邮票；信封上写上收件人之后，后面还要写一个亲启；如果信封里放了照片，要在信封上写上“内有照片，请勿折叠”；如果拜托对方做事儿，后面要加一个为盼；讲究些的，信尾的祝福语要随四季而流转，顺颂春祺，即颂秋绥。

从提笔到送达，从山东到新疆，跨越千山万水，一封信一等就是十天甚至半月。在没有即时通讯、没有短视频轰炸的日子里，那时的人们学会了等待，也享受于等待。等待那几页有着墨墨香气的薄纸，经过了万水千山，来到手中时的欣喜。

那时候的日子啊，大概就像木心诗里说的那样，车马，邮件都很慢，一生只够爱上一个人。

慢，不仅让时间变得柔软，也让情感有了沉淀的空间，和想念的人隔着千山万水，等足了十天甚至半月，才能从一封长长的信中，知道他过得是否安好。信在掌心，隔着很远，知道牵挂的人过得很好，就已足矣。

长大了之后的我曾对我妈说，原来你和我

爸是“笔友”啊。写信是他们两个人之间，我唯一能够“看得见”的浪漫。

每当夜深人静，一盏昏黄的灯下，笔尖轻触纸张，沙沙作响，仿佛能听见时间轻轻地在字里行间缓缓脚步。每一字一句，都凝聚了写信人深深的牵挂与真挚的情感。

两个人，虽远隔万里，又仿佛近在咫尺，通过一封封信件，共享着彼此的喜怒哀乐，共同编织着属于他们的故事。

我至今心动的一首诗，芬兰女诗人瑟德格兰的《一个愿望》，“在这个阳光的世界里，我只需要花园里的一张长椅和晒着太阳一只猫，我将坐在那里，怀里揣着一封短信，很短很短的信！”

那是一封怎样的短信？引人无限遐想。虽然我妈说和我爸的信里不过是聊一些家常，那怎么称呼呢？一开始连名带姓外加同志，后来是去掉姓，在名字后面缀上同志二字，再后来，只剩言简意赅的名字。

“妈，你看上我爸爸什么了？”  
“你爸爸相好啊，一看就是个可靠的人。”

其实我爸一笔好字应该给他加分不少，让我忽略了方言的那一点点阻碍。

二十几岁的我妈，那时候除了去过一趟东北之外，还没走过这么远的路。从威海到新疆，4000多公里，足足走了8天，汽车转火车，火车倒汽车，在济南、郑州和兰州转车，甚至在车站过夜。她清楚她要去的那个农场远在天边吗？她知道农场的生活很苦吗？她知道西北的风沙有多厉害吗？

“哪想那么多，就是不想在老家待了，成分不好，被欺负。”

我没问过我爸，从我记事起就习惯了他的沉默寡言，觉得他一直在掩饰着什么秘密，仿佛一开口说话，就会不小心把他的秘密泄露了。后来的后来，我再想问，也没有机会了。

反正，他们跋涉千里，为我和妹妹创造了这个世界上离得最近的两个词——爸爸妈妈。多年以后，我才清楚，他们的迁徙还为我和妹妹创造了一个故乡——

那里蓝天常常发呆  
黄昏总是自顾自收敛一身光芒

它们从不考虑  
我们欣喜也好，悲伤也好

生活一天天变小

正如它曾一天天变大

每个人走在路上

都背负看不见的粉红色大象

地球也是一样

它载着那么多春天的风，冬天的雪

夏天的花朵，秋天的河流

一刻不停地转动

一个南腔，一个北调，终于走到了一起。

南腔中，知道了我爸的老家有好多大山，他说有一座山长得和猫儿一模一样，所以叫猫耳山；还有一座山长得像一只站在江边伸鼻豪饮的巨象，所以叫象鼻山。它们栩栩如生在我的心里，虽然小时候在农场，只看到周围的沙丘，连绵起伏。

北调中，知道了我妈的老家有大海，海里有很多好吃的，我妈最喜欢夏天的凉拌海蜇。她说刚打捞上来的海蜇，被切成一方一方像凉粉一样在集市上卖。赶集的时候，姥爷会买一些回来，切成小块儿，用酱油醋和蒜那么一拌，别提多好吃了。

农场不只有我爸我妈，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人。他们或者支援边疆建设，或者只为寻求改变，所以农场不只有广西话、山东话，还有陝西话、上海话、北京话，哪儿的话都有。

“可我小时候为什么说河南话？”

那是因为50年代末，有将近5万名河南青年支边进疆，成为兵团建设的重要力量。我爸

说，这些支边青年不仅在兵团扎根，他们的方言——河南话也随之在兵团中传播开来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些支边青年的后代也在兵团中继续传承着河南话，使得河南话成为兵团的强势语言。

我爸我妈所在的团场是农六师106团，当时有8个农业连，有加工厂，有畜牧连，我爸在工程连，我妈在五七连，我爸随着工程走，常常去乌鲁木齐出差。

一年级暑假，我跟他去了一次乌鲁木齐。他上班时，我就在宿舍附近玩，认识了一个叫王小红的女孩。除了羡慕他家里有很多很多的空白本子之外，他爸爸可能是仓库保管员之类，还羡慕她有一口和我不一样的普通话。我积极地学她说话的样子，发现她形容完一个东西之后，总要加球子这两个字，脏球子乱球子，好看球子，我不知道那是不是粗话。反而觉得洋气，比我的河南话好听多了。

9岁时，全家搬到了乌鲁木齐，我也开始说普通话了。对于许多人来说，方言是身份认同的标志，它让你感受到自己属于某个特定的群体或地域，有归属感和安全感，甚至一些自豪感。

新疆味普通话一直伴随着我。从西安到山东，不知不觉间，那种“羊肉串的味道”越来越少，话说得越来越标准，却越来越感觉自己无论在哪里，都是外地人。

到电台工作后，需要普通话考级，主持人必须达到一级乙以上才能上岗。有一年在北广短训班，来自天南海北的我们自诩说的都是普通话，但一开口老师就知道你是哪里的。广东、湖南、陕西、辽宁、上海……

“一听你就是新疆的。”  
哈，隔了这么多年，还是被一下子认出，口音，和长相一样，成了我的另一张身份证。



盛文强

## 月夜访友

冬季里休渔，父亲在家闲了起来。他把所有的渔网修补一新，剩下的时间里，他整天唉声叹气，吃也不香，睡也不安稳，经常在房子里走来走去。这天他忽然想起邻村有一位朋友，于是晚上草草吃了饭，就带着我去看他的朋友。

那时的冬季好像要比现在冷得多，海湾里多处结了冰，渔船归岸，渔民们要蹲在火炉边耐着性子，消磨将近三个月的漫长时光。连日来，父亲的朋友也是窝在家里守着火炉。我们沿着海边的沙土路走着，地上已经是漆黑一片，海水在我们脚边不远处涌动，奇寒之下的海水是一种接近于冰的半固体流质。街上没有行人，我们听着自己的鞋底敲在路面上。路过几间房子，房子后窗大都亮着，前院传来敲门声，先是一下一下地拍打，后来连成急促的一片，还伴随着高声呼喊，我们心头一惊，后来才知道，有一位老人晚上突发急病故去了，他的邻居在找老人的儿女们报信。紧接着狗就叫起来，一只狗叫，十几只狗跟着叫，乱作一团，有一只狗顺着院里的台阶窜到了房顶，低头朝我们狂叫不止，回头望，亮着的灯熄灭了，四周恢复了沉寂，空旷的渔村周围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。

父亲的朋友住在靠近田野的几间瓦房里，他的名字我记不起来了，父亲好像喊他“建堂”。我们进去时，他和妻子正在织网，屋里黑着，他们把头贴到网扣上去，或许是节省而不愿开灯，窗外的一点星光无济于事。父亲咳嗽一声，他的朋友拽开了电灯，我看到炕桌上碗筷还没有撤下，红木的桌不知传了几代，靠外的两条桌腿之间又加了一条黄木的横梁，钉帽闪着亮光，看样子是新钉上去的。桌上摆着一篮子玉米饼，半盘乱糟糟的杂鱼。粥碗上还挂着玉米糊，发黄的竹筷横担在碗上，两个孩子躺在墙角，叽叽喳喳唱着歌儿。女主人横端着桌子下炕去，桌上的碗筷纹丝不动，稳稳放进里间屋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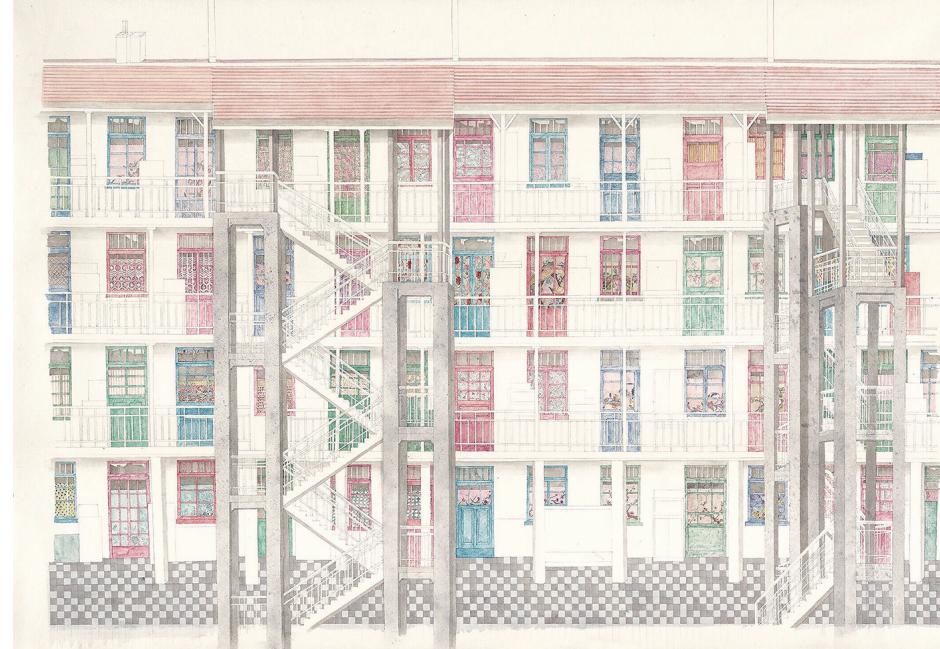
父亲的朋友起身迎了下来，他掀开火炉盖，扔进几块煤，不多时，炉火明亮起来，他们围着火炉喝酒，就着海米和乌贼干。父亲的朋友见我在一边站着，顺手递给我一把乌贼干，这是一种晒干的小型乌贼，只有指头长，比手指稍粗一些，几个绽起的三角鳍在我指缝里冒出来，微微合拢手掌，乌贼干在手里碰撞，树枝似的咯吱的声响，它们小小的身体盈满了我的手掌，似乎随时都会脱手飞去。乌贼干硬如木柴，和乌贼柔软的身体已经相去甚远了，扯开外壁，就会有絮状的粗丝出现在断口处，乌贼鼓出的眼珠混在一丛密集的腿中，眼神若有若无，毕竟它的眼睛只有一对，而腿却是那样多。我一时间没舍得吃，在手里攥了一会儿，掌心就沁出了汗，于是我把它放进裤子口袋里，裤袋立刻鼓起来，大腿上受到一阵重压，我捂着鼓起的口袋，心里暗自欢喜。

父亲让我上炕坐着，炕里边靠窗的地方躺着两个孩子，稍微大一点的是女孩，小一点的是男孩，他们还都没有睡，眨着眼睛看我，看得我浑身不自在，他们的母亲回到炕上，递给我一个枕头做靠背，我坐了一会儿，炕上的热气透过棉裤涌上来，给我带来一阵睡意，背后的枕头松软，我倚着墙睡着了，朦胧中听到父亲在和朋友说话，一开始说些船上的事，他们开春后又要出海了，后来只有高一声低一声的节奏回荡在耳鼓，更加深了睡意，他们说的什么我逐渐听不清了，他们的声音就像来自另一个国度。

父亲走时叫醒了我，已经接近半夜，黑暗中我看到这家的小儿子躲在母亲身后，在他母亲的胳膊底下探出头来，月光正照满了炕，他眨着眼睛望着我，眼珠闪亮，嘴角往上翘着，带着隐隐的笑意，我由于困倦，一句招呼也没打，走在回家的路上又挨了父亲一阵埋怨，才想到实在是不应该。

回到家，母亲早已经睡下了，院门虚掩着，我和父亲回身悄悄合上了院门，高抬腿轻落步，生怕惊动母亲，满地月影照在院子里，照出了一高一矮的两个黑影。我把手伸进口袋，口袋是空的，乌贼干已经不见了，干脆把两个口袋全翻出来，袋底并没有漏洞，翻来找去，终于在口袋的角落里抖出一根发丝般的乌贼腿，旋转着掉在地上摔成两截，在月光的照射下急剧萎缩，蜷成了一团。

直到现在，我还时常想起那年随父亲访友的情形，也时常想起他家的小男孩闪烁在黑夜里的狡黠的眼睛。



兰台惠质

■里院魔方 于瑶

## 消失的青岛“海西区”

青岛进入城市化进程之后，曾出现过很多已经消失的“区”，如四方区、台东区、沧口区、台西区、四沧区、李村区、大鲍岛区等。如果说前述这些消失的区，可能或多或少还存在于人们的记忆里，且只看区名，还能基本判断出大概的位置，有一个区，可能很多青岛人并不清楚它曾经在哪，甚至不知道它的区名，这个区就是——海西区。

海西区，顾名思义，与海有关且在青岛西部。事实上，海西区大致的位置就是胶州湾海域及其北、西、南部沿岸陆域。在青岛城市史上，大多时候海西区属于乡区。青岛从德租时期起，即被划分为市区和乡区，但这两个时期并无海西区。海西区最早出现在1922年，中国政府收回青岛行政权之际。

1922年12月10日，中国政府收回青岛行政权后，辖境仍沿袭德国租借时期的境域。据《胶澳租借条约》，清政府于1898年将胶州湾及周边陆地岛屿，白沙河以南、砖塔岭以西的崂山地区划入租借地。陆地面积共计551.753平方公里，海域面积560平方公里。这一境域一直延续至1935年。根据《胶澳商埠自治章程》，回归后的青岛市市定名为“青岛市”，包括青岛市街、台东镇和台西镇。市区以外皆为乡区，但胶澳商埠初期并无海西区。关于海西区的档案，最早出现在1926年。该年1月1日起，胶澳商埠水警改编为陆军，原水上警察署重新定名为海西区警察署。改名后的海西区警察署在原管区外，增加了原青岛第二署所管的新疆、小港两路。署址仍在新疆路3号。1926年初的海西区警察署厅委任梁逢任海西区警察署署长，陈鲤庭、李继舜为署员，陈寄尘、张兆骏、陈基为办事员。另有书记1人、一等巡官4人、二等巡官4人、三等巡官3人、靖澳巡舰舰长和定澳巡船船长各1人。

在1928年的胶澳商埠区域图上，可以看

到当时全市的分区为第一区、第二区、台东区、李村区、四沧区、海西区6区。其中，第一区和第二区为市区，其他4区为乡区。图中的海西区从某种意义上，可谓当时青岛最大的区，包括胶州湾、阴岛（现红岛）、今胶州市东部胶州湾沿岸、黄岛、薛家岛、水灵山岛等。

1929年4月，青岛进入南京国民政府第一次统治时期，海西区仍在。1932年，青岛为实施自治，将全市划分成12个自治区。其中，第一至第四区均位于市内，第五至第十区为市外乡区，第一区在胶州湾西岸，第十二区在胶州湾北岸。海西区暂时消失，基本被第十一区和第十二区分割。1935年5月，青岛市政府重划市乡区域并改定名称。市区划为8区，即东镇、西镇、大港、小港、海滨、浮山、四方和沧口。乡区划为11区，即李村、崂山、台东、台西、海西、四沧、李村6区，海西区被列其中。以保甲区划分为市南、市北、台东、台西4市区，以及四沧、李村、崂山、崂西、夏庄、阴岛、浮山、薛家岛8个乡区，海西区所辖地域重新回归乡区，且被分割为阴岛和薛家岛两区。1949年，青岛解放前，国民党政府又实行警保区划统一的办法，市区划分为市南、市北、台东、台西、海西、四沧、浮山6区，乡区划分为李村、崂山、崂西、夏庄、阴岛、薛家岛等6区。海西区再次消失。值得一提的，1945年12月底，中共青岛市委决定成立海西工作委员会（对外称海西办事处），统一领导灵山卫、薛家岛、黄岛、辛安地区的工作。

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以后，改为山东省辖市，境域大大缩小。原属青岛的胶州湾北、西侧的陆地及岛屿分别划归即墨县、胶县和胶南县管辖。青岛市原崂东、崂山西部分郊区建立崂山行政办事处，归南海专区领导。1950年6月崂山行政办事处划归胶州专员公署领导。这是青岛市辖境最小的时期，全市面积仅有210.65平方公里，原海西区所属区域已基本不在青岛境内。青岛解放后，青岛市人民政府对区划作了调整。全市划分为：市南区、市北区、台东区、台西区、四沧区、李村区、浮山区。此后，虽然青岛境域陆续扩大，原海西区所属区域陆续归回青岛，但海西区作为一个区名在解放后彻底消失。

